

陈辛仁^①

地点：北京报房胡同 69 号

时间：1994 年 10 月 15 日



陈辛仁

钟：今天我很高兴能够拜访您，希望您谈谈当年在日本留学的情况。头一个问题：您为什么去日本？怎么去的日本？

陈：我就从这个问题谈起来吧。我学日本文是高中时的第二外语。那时我在潮州，广东省立第四中学，也叫金山中学，高中部。我是从福建陈家庚办的集美学校转过来的，1930 年上半年转来插到高中一年。那时高中有文理科，我学理科功课不太好，就着重学文科。第一外语是英语，第二外语是日语。那时是东京帝国大学一个毕业生来教的。在潮汕百科上有他的简历，他是学生物学的，叫杨金书，潮安人。

^①陈辛仁：1915 年生，广东人。1934 年赴日本，1936 年回国，到新四军做政治工作，1949 年后，任福建省政府副主席、驻外四国大使、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。

我对他的课很有兴趣，我跟他学习生物学和日语，每周三次三个小时，上课比较有趣。课本是国内的，好像是中国人编的，商务出版的，平装几册。老师教课很认真，叫我们打好基础。学了一阵子，觉得文法容易掌握。教得法，有兴趣。有时我去他家拜访，他就拿出简易的日文小册子，叫我拿回去看，我回来也能看下去。我学了一两年，自己就能看点书了。我所在高中图书馆里有几个书橱的日文书。这些日文书，是过去留日的一位学者杜国庠^①的，他另一个笔名林伯修，这是他的藏书。他曾在上海主持社会科学联盟，那是地下活动。杜先生当年在这学校当过校长，1927年，蒋介石一反共，他赶快躲开了。书就留在学校了，管图书的人就把书放在一起。我们懂日文的学生，就找他商量，借来看看。杜先生留下的书，全是社会科学、马克思主义的书。

钟：您真有福气。

陈：当时图书馆里中文书很少，有彭湃写的小册子，也可以借来看。最重要最多的还是日文书，借得最多是马列的基本著作，日本译的，装有好几个书橱，有《左派的幼稚病》、《反杜林论》等。还不够的话，中学校附近有一个小书店，可以从书店中订购书，从上海日本书店订来的日文新书，马列主义的日文书。

钟：您买过吗？

陈：我买过，买来看，书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当然，书不是公开发售，是有专门的贸易栈，知道有熟人要看，才卖的。检

^① 杜国庠（1889—1961），广东澄海人。中国哲学史家。1907年赴日本留学，1919年京都大学毕业后回国。曾任北京大学教授，《中国文化》主编等。与侯外庐等合撰《中国思想通史》。有《杜国庠文集》。

查也少。

除了日文书，也有英文书。当时美国人易罗生在上海出版杂志《中国论坛》，一边英文，一边中文，我们也买来对照学习。在课堂上，老师教我们莎士比亚的作品，念戏剧故事。我们自己看政治书，中英对照和日文的。我们那时学习的积极性就是这样造成的。

钟：哟，不简单。

陈：我们同学间谁看到什么，就互相讨论交流；有看不懂的就互相帮助一下。所以我念到高中三年毕业，两样外语都可以看基本的书，社会科学书、自然科学书都可以看，文艺比较难一点。

1933年夏天我到北平，主要是向往北平是一个革命文化发展的中心。我参加左联文艺研究部工作，地下活动。我的正式身份是中国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学生。中国大学校长是国民党的王正廷，学校地址在二龙路（现在为教委）。到北平，日语更需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苏联许多书我们看不懂，靠莫斯科的英文的《国际通讯》。另外，在现在东单菜市场附近，有一间东亚书店，日本人开的店。我去看和买一点翻译成日本文的苏联书，当然也有日本的杂志，《中央公论》、《改造》呀，都可以买到。当时要知道外面的消息，只有看书里的学术新动态、文艺新动态。日本文化比较发达，国外一有新东西就翻译出来。检查也仅××几句，大致还是看得出来。

钟：买书贵不贵呀？

陈：买书要花点钱啰，还是尽量买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天津街北京图书馆，这馆有世界上许多种杂志，就去查找我们所需要的，例如经济上的问题。是以英文为主。

另外，为了提高日文水平，我在中国大学还选修第二外语。

当时在中国大学教日语的教授是台湾人，叫张我军，他著译书多种，与日本领事馆也挺熟悉。张教授自己编有日文教材，一周上几次课。

钟：张教授教学的特点或观点怎么样？

陈：哦，他可是与高中的老师不同，高中时的老师是学生物学，业余的。张教授特别认真，授课的班也很大，他的解释很清楚。我的日语有了点基础，后来确定要去日本，就是请他写一封介绍信，拿到日本领事馆，办一下就去了日本，别的手续不用了。我学日文是为了学马列主义，当然也就要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。当时，马列主义也是日本文化中一个流派，像河上肇等人。

以后怎么确定去日本呢？是被国内形势所迫。原来没想去，不得不去，就是因为左联组织被破坏了。当时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驻在北平，专门反共镇压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在“九一八”之后，已经向河北关内伸侵略之手，搞冀东政权，国民党不抵抗，反倒反共镇压。我的关系断了，只知东京有人在搞左联，我有个同学想去日本求学，他一点日文也不会，而我已经被注意，天天躲来躲去。我的福建老同学就说：“你懂日文，现在陕北是不能去了，我们一起去日本吧。我给你出路费。”我这同学就给我出了22块钱，给我买了船票，包括零用钱。我们请张我军开了条子，日本领事部同意了，我们3个人就从北平到了塘沽。

上了日本船，是二三千吨的日本船，可能是定期中日航线。大舱里男女分开住，我还记得我的下铺是一个日本老人，我们没事就谈话。他是做古董生意的，他的中国语很好，他得知我们是去学习的学生，有次就偷偷地告诉我说：“你看那一个日本人（那人穿一套西装，年纪比较轻），那个人是侦探，干这种职业不好。”我问他：“为什么不好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家里有这么多

个人，家里人就会互相猜疑，不安心，人心惶惶。”

钟：他对中国人倒放心，给你们讲这个人？

陈：他看我们是学生嘛。我们一上船，船上就有便衣，暗暗观察。那个人不直接找我们，我们也就半信半疑。

船到第一站是门司。海关的人只问有无香烟什么的，在船上已经有人用英语简单问过了。在门司要登记，登记时，老头讲的那个侦探也在场，他是看看我们讲得对不对。我们讲来读书也就成了。

我们接着乘原船到神户，去转乘火车。我们第一次看到日本平民，很多人穿木屐。街上没什么人力车，有汽车。我们到旅馆暂歇等候，吃饭时大家围矮桌子坐着，下女端来饭菜放下，她不走，看着你吃。这几个年轻人吃不下去了，看得脸都红了。吃一碗就说吃饱了，走出饭馆，大家说再找饭吃去。

我们仅在神户停半天，店主还叫车送我们到车站。到了东京，有同学来接，住在神保町，靠近中华基督教日语学校。房东是一对裁缝，有座两层小楼，楼下是工作间，他们一天到晚佝偻着腰在干活。我们住在楼上，3个人住一间3席至4席大的房间，这样很省钱。

我住下后，先到日语学校补习日语。教员是陈先生，老教授，我听过他几次课。那时是1934年，日本已经有地铁，家中有瓦斯，上电车给票上打洞，转车也方便。车中人多读书。我们有时在路边停下来看看，几部“的士”就会冲过来招呼，把我们吓一跳。以后知道了，要车招手，在人行道上不要停留。街上很干净。

钟：您住在神保町，那可是日本人才荟萃之地！

陈：神保町到现在还是书店汇集的地方，有许多书店，书店夜市发达。书的内容从古到今，方方面面。有的译西文新书



出租屋（1938年）

出版几天，就有上夜市，哲学、经济学什么的都有，一块钱书价花一、两毛钱就能买到，什么书都有。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去逛书夜市，书买回来自己读。有各种书店，日本共产党解散后，也有一个合法书店“那乌卡”（科学）。还有岩波等等。

我没有进专门学校，就是以日华学校学生身份。我住过几个地方，神田、池袋，当时都十分荒凉，现在全是高楼。当时从地铁出来，一边是荒地，一边仅是两层小楼，走上一两里地，就到我们当

时搞活动的地方，叫三闲庄。左联在那里开会，编中文刊物《质文》、《杂文》。当时有4个人住在里面，楼上楼下，全是中国留学生。

左联当时还编了一套文艺理论小丛书，编好送到上海出版，一共10本，第一本是郭沫若翻译的。我翻译了两本。

那两种杂志开始是在神田一家印刷厂印的，警察来查了，报上就发表出来，说是非常遗憾，竟然是神田某印刷厂印的，这样压力就大了。郭沫若给杂志写文章最多，鲁迅先生也寄来文章发表。另外也有公开的日文《改造》、《中央公论》上的文章，我们也译过来。鲁迅在中国不能发表的文章，用中文寄过来；另外还有田汉的文章，他才从牢里出来不久；茅盾用答复问题的

形式写过东西；还有日本人写的，当时秋田雨雀^①先生也写过。我记得，有一次我同林林在二楼喝茶，同秋田先生见了面，约他写文章。他写来了日文的，我们再翻译。他是很高兴写的，是关于文学遗产的内容；还有一位高村阳造先生，我去拜访过他，他也是搞文艺理论的，同那乌卡社有关系。他写过欧洲文学史。

在我之先，从1931年就有在上海的左联人去了，已经办了一个杂志《东流》。后来魏猛克来了，北方陈伯鸥、邢同华他们也来了。大家觉得再办一个短小精悍的、有战斗性的杂志，同当时在四川的郭沫若商量，他很同意，就办起来了。魏猛克、我、陈子谷（诗人），3个人就办起来。在池袋租了座两层小楼，就成了杂文社。编辑主要是魏猛克，我几乎是副手，我比较注重文艺理论。稿源以中国留学生为主，在上海杂志公司销售。每期约印1000册，基本双月一刊。

日本刑事经常来，有时几个人一齐来，乱翻我们的东西。客气点的就说：“别人对你做不好的事，所以来看看你。”他们对杂志本身也查。

钟：杂志经费来源呢？

陈：左联筹集的，其中有革命烈士家属捐献的。例如出版文艺理论小丛书时，邢同华交100元出来，说是天津一位烈士的母亲保存的钱，一定要交给革命团体起作用。还有些钱是从生活费中凑来的。

后来警察直接查印刷厂了，我们印了几期，就只好转回国内印了。国民党在上海也查，我们就改名字，是郭沫若想起改成《质文》，从文质彬彬来的吧。现在国内已经重印了。

^① 秋田雨雀（1883—1962），日本作家，世界语学者。曾创办剧团“先驱座”。其戏剧集有《三个灵魂》、《佛陀和幼儿的死》等。

郭沫若那时住在千叶县市川，我们去拿稿，他就现写。我们就等着，碰上吃中饭，郭安娜招待，一人一碗面。等他写完，我们再拿走。

1936年1月初，我们同丘东平、周扬联系好了，要回上海，然后去苏区。走前，我们去郭沫若家，他正在写大革命失败时经过流沙的情况，那儿是我的故乡，但我讲不大清楚方向，他交代我回去要查一下地图。安娜就送我们出来到街上，她买了包糖，请我们送到上海自然博物馆，给她的妹妹，是陶晶孙的夫人。后来我送去了。

至于鲁迅，是由魏猛克联系的。鲁迅很支持，允许我们翻译他的“孔夫子在中国”等文章发表。但他反复劝郭先生小心，要做合法斗争之意。他们两人只有在这个杂志上共同发表过文章。

钟：您在日本印象深的有什么事？

陈：我们曾遇上防空演习，天一黑就开始，路灯全没有。在屋里如果要开灯，要用黑布掩盖好。有一次下大雨，我从地铁出来走回家，看不到路，也看不到值勤的人，到跟前才有人咳嗽一声。当时这种军国气氛给我印象很深。

太平洋战争将到来，有日本人曾经问我：“少年先锋队歌怎么唱？”我会唱，我唱，他们就用笔记下来。

我们也搞过戏剧。当时左联的吴添是导演，杜宣也参加，地点在中国青年会，演出过曹禺的《雷雨》。还有吴添他们编的《洪水》，是白珂主演。我看了排演，很不错。

钟：文艺理论小丛书呢？

陈：那是翻译苏联和西方的文艺理论，其中我翻译了两本。我还翻译过一本哲学书：《德国宗教和古典哲学》，是海涅著的。我现在只有复印本了。那些丛书是我带回上海出版的。